

張縉杜詩學研究

徐國能*

摘要

本文意在說明杜詩學的研究並非對單一批評作品的分析，而是各時代不同作品間的流動關係，文學批評亦存在互文性的可能。在杜詩學史上，看似孤立的作品，其觀念、方法與內容、形式等，往往與前行作品有著相當密切的互文關係。本論文探討明代儒者張縉的杜詩學，考證其三部著作間的關係，以及他對元代杜詩學的因承問題。並分析其杜詩詮釋的方法與特色，實乃承自張性《杜律演義》而來，其追求本義，卻反而因時代與個人侷限而失卻真旨，皆反映了他詮釋杜詩的不足之處。因此本文進而思考在杜詩學史上，論詩者雖有自覺，但仍一再陷於附會論詩的問題，是知杜詩中的倫常特性，並非以呆板的附會所能體現，而是存在於讀者意識中。

關鍵詞：張縉、杜甫、評點、詩法、杜詩通、杜律本義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一、緒論：杜詩學史中的張縉

明代的張縉（1487-1543）在詞學成就上廣為學者所注意，但他在杜詩學方面的成果與意義卻隱晦不顯。清人杜詩學大家如仇兆鰲（1638-1717）、楊倫（1747-1803）等，對張縉之說卻頗有徵引，顯見其論信非妄誕。然張縉的杜詩學固有值得翫味之內涵，但其意義亦不能孤立看待，而應放諸杜詩學史的發展脈絡，才能明其創作之形成與侷限之所在，也才能透過他的證例來進一步理解古典詩歌批評的發展動態。

杜甫（712-770）對中唐以後詩歌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繁密複雜，但在杜詩影響發生的同時，學者與詩人也將自己的才性反饋於杜詩，對杜詩詮釋投注了大量的文化智慧，浩蕩的工程隨時間綿延，杜詩學遂成為餽贈與反饋、影響與詮釋、理想與實踐的辯證過程。入宋以後，隨著杜甫整體評價不斷攀升，過去零星、隨意的點狀批評，遂發展為面狀之整理研究，無論詩集的編纂、年譜的攷劾、字詞典故的註解等基底學術工程，都在宋人手中得到了相當巨大的成果。同時透過在創作上「學杜」的風氣，杜甫的人生精神、詩法組織、語言風格及藝術觀念等藝文屬性，也逐步內化為古典詩學中重要的成分，後世學者、詩人都在一種「杜甫影響」下體驗詩歌內涵並建立審美經驗。

元代詩學重於律體並喜言詩法，元人的杜詩學自南宋末劉辰翁（1232-1297）批點杜詩以降，宋人企圖客觀呈現杜甫詩原貌的理想受到挑戰，說詩者以己意解說杜甫詩旨詩法、析論章句之內容和創作技巧等皆廣受讀者歡迎，他們一方面將杜甫詩法條件化，以歸納藝術手法類型作為詩歌創作的教學藍本，因此有《杜陵詩律五十一格》這類作品；¹ 另一方面則誕生了如張性（?-?）《杜律演義》這樣以敷

¹ 可參徐國能，〈元代詩法作品中的杜詩觀〉，《文與哲》第22期（2013年6月），頁305-353。

陳大旨、衍流己意的說解闡釋之作，進而成為了杜詩學史上一種新的論詩形態。

《杜律演義》成書於元朝末年，作者張性雖然並未顯達，但此著卻在明代受到了廣大的歡迎，明代翻刻、偽託此書者眾，最著名者即為偽託虞集（1272-1348）的《杜律虞註》，此書不僅風行國內，甚至行銷海外；另如張孚敬（1475-1539）《杜律訓解》、王維楨（1507-1555）《杜律頗解》、馮惟訥（1512-1572）《杜律刪注》等，都是由《杜律演義》改編刪修而來。《杜律演義》之成功，在於除了註解以訓辭意之外，另以文字闡釋詩歌內部的含意，透過比興發明杜甫之心跡，使一般讀者透過這些說解體會杜甫用心之深、詩法之嚴；這現象說明了當時普通讀者對自己是否能讀懂、讀通杜甫詩缺乏信心，故需仰賴一位權威讀者的指引才能登堂入室一窺其奧，這也是為何此書託名虞集、王維楨、馮惟訥等詩學大家的原因。²

但在明代也有不少學者精益求精，模仿《杜律演義》之說詩體例，對杜詩作出了更詳細的分析，闡發了杜詩中的幽微詩情，張縉的《杜詩通》、《杜律本義》即為代表。³ 至於清代，金聖嘆（1608-1661）《杜詩解》、黃生（1622-1696）《杜詩說》、吳瞻泰（?-?）《杜詩提要》、浦起龍（1679-?）《讀杜心解》等，皆可視為此類之後續。

張縉為明代中後的詞學家與詩人，人品高潔而學力深篤，在詩詞兩方面都有成就，詞學方面著有《詩餘圖譜》、《草堂詩餘別錄》；詩歌方面有《杜詩通》，共選評杜甫詩 317 首，《杜律本義》則論杜甫七律 151 首。此二著主要內容包含了註解與評說，其中有不少精闢之見，可視為明代杜詩學代表作之一。舊注中王嗣奭（1566-1648）《杜臆》、楊倫《杜詩鏡銓》等名家皆徵引張縉之說，至於仇兆鰲《杜詩

² 可參徐國能，〈張性《杜律演義》研究〉，《東吳中文學報》第 29 期（2015 年 5 月），頁 61-95。

³ 張縉另有一部《杜詩釋》殘本，不見諸載錄，詳下。

詳注》引述最繁。然當今學界對張縉的研究多集中於他的詞學成就，其杜詩學似乎未受青睞，目前僅見大陸地區有王燕飛〈明代張縉的杜詩研究〉及葉輝碩士論文《張縉研究》、劉姝潔的碩士論文《張縉及其文學思想研究》，⁴ 但張縉在杜詩學上價值，以及他詮釋杜詩作品的方法與利弊，似乎並沒有完整地呈現出來，是故本論文一方面解析張縉在杜詩學上的成就，同時也期待從杜詩批評史之脈絡來觀察張縉的繼承與創造，並反省說詩傳統在當時所面對的困境。

二、張縉杜詩學的成書與評價

（一）張縉與《杜詩通》、《杜律本義》之成書與評價

1. 張縉及其詩歌創作

張縉，字世文，號南湖，高郵人，明武宗正德八年癸酉（1513）舉人。由於其仕宦未顯，生平資料比較貧乏，目前論者多依張縉好友顧璘（1477-?）所撰〈南湖墓誌銘〉⁵ 為說。

張縉十三歲失父，勤於學問，嘗投詩予王陽明（1472-1528）述其志：「我生百無能，承志窮一經。云胡不自勵，蹉跎日沉淪」，⁶ 王陽明亦稱其豪傑，並有書勉勵。弱冠後從同鄉先輩王磐（號西樓，1455-1524）遊近二十年，王磐一生未仕，為散曲名家，影響張縉詞學甚深。張縉廿六歲中舉人後，八上春官不第，任武昌通判時政績卓著，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擢為光州知州，此時他已五十三歲，旋

⁴ 前見王燕飛，〈明代張縉的杜詩研究〉，《文藝評論》2013年第10期，頁42-46；葉輝，《張縉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文學碩士論文，2000年；劉姝潔，《張縉及其文學思想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4年。

⁵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張南湖先生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冊68，卷附錄1，頁395-397。

⁶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感述呈王陽明〉，《張南湖先生詩集》，卷1，頁330。

因「武昌上官誣君怠事遊詠」(〈南湖墓誌銘〉)，未葺而罷，歸隱武安湖畔，自號「南湖居士」。晚年貯書千卷，手自標點，晝夜誦讀。據〈南湖墓誌銘〉載，張縉「為詩文操筆立就，而尤工於長短句，率意口占，皆合格調，然不欲以此自名，嘗謂人：『貴於道有見，無汲汲於立言也』。」⁷

現存《張南湖先生詩集》四卷為張縉亡故後，其子張守中(?-?)所編纂，收錄詩歌始於弘治十四年，終於嘉靖十九年，同郡朱曰藩(?-1561)為詩集作序論其風格：

弱冠作〈無題詩〉及〈香奩雜詩〉數十首，一時盛傳，以為淮海才子。……入楚後詩格更奇，辭更古、旨趣更沈著，方將超西崑之吟域，闖少陵之堂室。⁸

今觀張縉早期詩作，如：「黃落空庭知已秋，彩雲夢斷思悠悠。從今莫向雕欄倚，一葉芙蓉一葉愁。」(〈秋詞〉)、「落花天氣春情困，垂柳門牆日色曛。深立綉簾人不見，清風吹露鬱金裙。」(〈效韓致光〉)等作，雖有晚唐風味，但也可感受填詞風味。其餘如「睡起楊花滿繡牀」(〈睡起〉)、「約伴尋芳陌上來」(〈陌上〉)等作。直可謂以詞入詩者，⁹張縉早年詩風近於一種以晚唐義山(812-858)、韓偓(844-923)及長短句交融的綺麗樣態，這可能和其從學於王磐有很大的關係。

朱曰藩〈張南湖先生詩集序〉稱：「入楚後……方將超西崑之吟域，闖少陵之堂室」，¹⁰當指張縉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前後通判武昌之事，¹¹此時張縉「弔古尋幽，多所述作，政聲文譽並起」(〈南

⁷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張南湖先生詩集》，頁396。

⁸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張南湖先生詩集》，頁325。

⁹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張南湖先生詩集》，頁327。

¹⁰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張南湖先生詩集》，頁325。

¹¹ 張縉何時通判武昌並無明載，〈南湖墓誌銘〉云：「嘉靖丁酉，予(顧璉)罷官里居，忽辱君惠顧，則通判武昌矣。」但其詩集卷三「嘉靖十四年至十五年」，即有〈登黃鶴樓〉、〈鸚

湖墓誌銘))，爾後張縉詩風的確有新變，如〈雜體〉：「岿岿千仞岡，上有孤生桐。老鳳巢其顛，鳴聲何啾啾」，一變縹豔而見高古之思；又如關心民瘼的〈滅蝗行〉：「君不見、千村萬落旌旗紅，鑼聲四合干蒼穹。又不見，家家翁媪焚金楮，競宰肥牲祀淫鬼。孽蟲作災今幾年，狼藉民夫天不憐。……」¹² 此類作品和他早期所作無論在內容和風格上皆有變化，更近於杜詩關懷現實且敘寫直白之風格，顯然杜詩對張縉晚期創作也產生了一定的實質影響。

2. 《杜律本義》與《杜詩通》之成書

張縉晚期在創作上既受到杜甫影響，但他完成《杜詩通》和《杜律本義》的時間卻更晚。在成書的次序上，張縉先完成了《杜律本義》，他在〈杜律本義引〉末書：「嘉靖己亥歲臘日高郵張縉書於采石舟次」，¹³ 是知此書成於嘉靖十八年（1539）。《杜詩通》成書的確切時間無法考定，但侯一麟（?-?）〈杜詩通後小敘〉：「竟又直道致歸，卧湖上……，最後迺取范氏所選杜詩，釋之曰《杜詩通》，書成，則仲氏携而軼之。」¹⁴ 是知成書應該在嘉靖十九年（1540）以後。由這個歷程可推測，張縉在嘉靖十四、十五年到任武昌以後開始受到杜甫詩影響，在嘉靖十八年先完成了杜甫七言律體的評述；歸臥南湖以後再依范梈（1272-1330）《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一書之選錄編裁而完成《杜詩通》，《杜詩通》裡七律的部分乃節錄或全錄《杜律本義》而來。

張縉作《杜律本義》的動機在他〈杜律本義引〉中說得相當明確：

鵝州吊古〉等詩，故張縉應在嘉靖十四年間即已至武昌。

¹²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張南湖先生詩集》，卷4，頁389。

¹³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臺北：大通書局，1974年），頁500。

¹⁴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9。

杜少陵雖稱詩史，而沉鬱頓挫，感人於言意之表，是其自負。說者乃謂其句句字字，咸有意藏焉，則牽合附會，而非本意者多矣。夫釋詩之病，舛誤者其失易知，牽會者其失難辯。將使初學之士惑焉。此予於杜律所以僭為之本義也。¹⁵

是知張縉欲刮除附會之說而專求杜詩本義之用心明矣，則《杜詩通》之用意應亦復如此。目前所見二書皆為張守中在明穆宗隆慶六年壬申（1572）刻於東甌之刊本，《杜律本義》最早刊版於嘉靖十九年，但在光州被燒毀；《杜詩通》則在成書後由張縉之弟張繪（？-？）攜赴定海謀求付梓，後借臨海舉人胡子重（？-？）抄錄而遺落，一直到二十年後張守中以職事分巡浙東時，有諸生胡承忠（？-？）（或胡子重之後人）進獻，此書才重見天日，當時允為美談。¹⁶ 因此張守中感嘆之餘重新刊行這兩部作品，歷來也沒有其他版本。

3. 《杜詩通》、《杜詩釋》關係蠡測

仇兆鰲《杜詩詳注·諸家論杜》中抄引一篇題為張縉所作〈杜詩五言選序〉曰：

有元宗工，首稱范楊。楊仲弘編輯《唐音》，詩家到今宗之，然不及李杜大家。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共三百十一篇，皆精深高古之作，蓋欲合葩經之數，標點分節，悉有深意。太史公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為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然則清江杜選，其亦有志求合於斯耶？惜世罕見其編。余家藏舊本，暇日為訂其舛訛，釋其大義，刻之郡齋，用貽同志。觀者精思妙悟，觸類而

¹⁵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499。

¹⁶ [明]張守中，〈杜詩通序〉、〈杜律本義後序〉，《張南湖先生詩集》，頁15-17、723-726。

長之，由清江之意而逆杜子之志，以上邇三百篇之旨，詩道盡在是矣。¹⁷

〈南湖墓誌銘〉中曾提到張縉另有一部《杜詩釋》，《杜詩詳注·凡例》亦載：「嘉靖間有邵寶之《集註》、張縉之《杜通》、《杜古》及《七律本義》。」顯然張縉注杜作品有三部，然張縉《杜詩釋》或《杜詩五言選》卻未見其他載錄，亦未流傳或見他書徵引。王燕飛〈明代張縉的杜詩研究〉一文提出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之孤本《杜詩釋》即為此書，據王燕飛研究，此書目前僅剩殘本，錄杜詩三十二首，王文並言書中僅〈夏日李公見訪〉、¹⁸〈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¹⁹不見於《杜詩通》，同文又云此書「當為張縉早年的杜詩學著作」。²⁰

《杜詩釋》一書疑點甚多，仇兆鰲稱此書「杜詩五言選」、「杜古」，但〈墓誌銘〉卻稱為「杜詩釋」而未言體式，《杜詩詳注》所抄錄的張縉序文則稱此書是據《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²¹而來。推敲其間關係，《范批》是一編年本，以五古、七古、五律、五言長律、七律、七言長律及絕句共分六卷。五古九十四首為第一卷，如果據王燕飛文所列《杜詩釋》殘本所存三十二篇作品，則此三十二篇全為五言古體，經比對這三十二首詩，發現全部是《范批》所選錄的作品，但前後秩序略有不同。故推測張縉的確依據《范批》而有注本，並賦予該書《杜詩釋》之名，以符序文所說「釋其大義」之內容；惟仇兆鰲所見時，

¹⁷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頁2328。

¹⁸ 此說失考，〔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夏日李公見訪〉，《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卷3，頁92。

¹⁹ 〈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目前不見於《杜工部詩通附本義》，但仇兆鰲卻引述了張縉的意見：「張縉注：瀟落。廓落也。」見〔清〕仇兆鰲，《杜詩詳注》，頁265，可見仇兆鰲不僅見過〈杜詩五言選序〉，應也見過全書之一部分。

²⁰ 王燕飛，〈明代張縉的杜詩研究〉，頁42-46。

²¹ 〔元〕范梈批點，鄭鼎編，《清江范德機先生批選杜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臺北：大通書局，1974年）。

其他諸體皆已亡佚，僅存五古一體的一小部分，因此造成了仇氏的誤解，將該書稱為「杜詩五言選」、「杜古」。此書因為海內孤本無法得見，其內容只能期待未來有機會親見原書時再詳細分析。而今天必須提出的疑問是，既然張縉已經據《范批》而為《杜詩釋》，為何晚年還要再依《范批》重作一《杜詩通》？

《杜詩通》、《杜詩釋》最大的差異，是成書在先的《杜詩釋》體例依《范批》為分體本，《杜詩通》雖也依《范批》所選詩作，以及其分體中的「概略分年法」，但打散各體，成為一個新的編年本。重編、刊刻《杜詩通》的張守中對此書交代頗詳：

……有唐（元）宗工，首稱范楊。楊仲弘編輯《唐音》，詩家到今宗之，（然）獨不及李杜大家。清江范德機先生批點（選）杜詩，共三百十一篇，皆精深高古之什（作），蓋欲合葩經之數，（標點分節），悉有深意。太史公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為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然則清江選杜，其亦有志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者（斯）耶？可謂嚴矣。先大夫南湖公髫髻即有志當世之務，蚤年舉於鄉，歷正德嘉靖中，涵操不露，與世異趣，耻覓知己，雅好古文詞，感遇之情，契於杜者獨深。暇日取清江所選杜詩為之註釋，證事釋文，悉加考究，以會杜子之本意，題曰《杜詩通》，不肖敬受而讀之，凡平日有疑於杜者，煥然冰釋，且知做詩之法，如此其嚴也。……觀者精思妙（妙）悟，觸類而長之，由先君（清江）之意而逆杜子之志，以上溯三百篇之旨，則是集之刻，尚有裨於風教哉（詩道盡在是矣）。²²

²²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16-17。引文中斜體部分為與前引〈杜詩五言選序〉雷同，括弧與底線則是兩者文字之差異

《杜詩通》依《范批》殆無可疑，文中「契於杜者獨深」，應是指張縉有志於政治，但卻仕途不順遂之事。不過，最值得注意者，是張守中有一段文字，與前引〈杜詩五言選序〉幾乎雷同，顯然張守中必定看過〈杜詩五言選序〉，而將該本文字彙括於自己的序文中，如此則張守中應也見過《杜詩釋》一書，但文中全無提及此書，故推測，《杜詩釋》可能是張縉依據《范批》而加以釋義的草稿，可能較為簡略或並非完整的作品，流傳也不廣。而《杜詩通》則是在《杜詩釋》的基礎上，重新創作、編年的完整本，就像張守中將父親的文字抄錄、保存至己文中，推測《杜詩通》應該也包括了《杜詩釋》大部分的意見，因此《杜詩通》之刊行，遂掩蓋《杜詩釋》之存在。

4. 後人對張縉杜詩學之引用與評價

張守中合刻《杜詩通》、《杜律本義》在明穆宗隆慶六年（壬申）九月（1572），但明代此書並未引起太多注意，反而清代的重要注本中，皆引述了張縉的說法。如王嗣爽《杜臆》在〈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畫鷹〉等兩篇引述張縉注釋；楊倫《杜詩鏡銓》中則有八處：〈前出塞〉、〈後出塞〉、〈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題省中院壁〉、〈送韓十四江東省覲〉、〈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河南夕望〉。浦起龍《讀杜心解》則在〈新安吏〉、〈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交〉、〈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等三篇徵引張縉意見。引述最多的是仇兆鰲《杜詩詳注》，約有五十三篇採擷了張縉說法。²³ 仇兆鰲

處。

²³ 〈遊龍門奉先寺〉、〈登兗州城樓〉、〈題張氏隱居〉、〈房兵曹胡馬〉、〈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贈李白〉、〈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樂遊園歌〉、〈前出塞〉、〈後出塞〉、〈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醉時歌〉、〈漢陂行〉、〈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九日寄岑參〉、〈上韋左相二十韻〉、〈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月〉、〈臘日〉、〈紫宸殿退朝口號〉、〈題省

採錄意見最多，這很可能是因為地緣關係，仇兆鰲是甬江（今寧波）人，張守中在「以職事分巡浙東」時刊刻張縉的著作，因此張縉之作可能流傳於浙東一帶，百餘年後仍為仇兆鰲所親見。

清人注本引述張縉意見的層面很廣，包含了詩作的繫年、背景，名詞的解釋，但其中最多的是他對杜詩詩意的詮釋，如〈詠懷古蹟〉：「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²⁴ 仇兆鰲在此詩末評，先引劉克莊：「臥龍沒已千載，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許之。此詩儕之伊呂伯仲間，而以蕭曹為不足道，此論皆自子美發之，考亭、南軒，近代大儒，不能廢也。」後引張縉之說：

見伊呂而失蕭曹，稱之無乃過乎？曰：此少陵有見之言也。蕭曹佐漢開基，不能致主王道，建萬世之長策，使帝王以來之制度，蕩然而不復見，至今有遺憾焉。孔明高卧隆中，三顧而起，固耕莘釣渭之遺風也，文中子稱其無死，禮樂其有興乎？然則指揮若定，誠非蕭曹所能班矣，夫豈過哉？²⁵

蕭曹（257-193 B.C.）助高祖（256-195 B.C.）亂世開國，諸葛亮（181-234）和他們功業相當，但杜甫以為蕭曹且不如諸葛，張縉以「致主王道」、「禮樂有興」為杜甫之評價尋根，的確和其他注本眼光不同。這種未必根本於杜甫本意而帶有個人色彩的詮釋，亦能成一家

中壁〉、〈曲江二首〉、〈崔氏東山草堂〉、〈新安吏〉、〈立秋後題〉、〈宿贊公房〉、〈天河〉、〈發秦州〉、〈卜居〉、〈戲為韋僊雙松圖歌〉、〈客至〉、〈送韓十四江東省觀〉、〈杜鵑行〉、〈秋盡〉、〈送路六侍御入朝〉、〈閩水歌〉、〈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除草〉、〈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牽牛織女〉、〈秋興八首〉、〈詠懷古蹟五首〉、〈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晝夢〉、〈登高〉、〈雷〉、〈寫懷二首〉、〈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祠南夕望〉、〈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²⁴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頁1506。

²⁵ 見[清]仇兆鰲，《杜詩詳注》，頁1507。此篇不見於《杜詩通》。而見於[元]張性，《杜律演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臺北：大通書局，1974年），頁666，原文末云：「少陵有見之言，非過稱也。」和仇書所引略有文字之異。

之言，或有助於初學。但歷來卻對此認識不多，張綖杜詩學最重要的評論是《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

……（《杜詩通》）每首先明訓詁名物，後詮作意，頗能去詩家鉤棘穿鑿之說，而其失又在於淺近。《本義》四卷皆釋七言律詩，大抵順文演意，均不能窺杜之藩籬也。²⁶

不過《四庫總目》的說法在周采泉（1911-1999）《杜集書錄》遭到質疑，周采泉認為《杜詩通》「在明代選本中，應為上乘。四庫譏其失之淺近，未為公論。」²⁷ 又曰：

尤其四庫於杜詩，「存書」往往不如「存目」者，而未「存目」之書佳什尤多。即以張氏之《杜詩通》而言，頗有超越前人處，亦以「淺近」見譏，安知《本義》之受刪汰，不正如此耶？²⁸

張綖注杜作品在《四庫總目》中未獲好評，事實上張注確有一些不免淺俗的見解，但他不少超越前人之說，其於杜詩功過如何，又彰顯了注杜之學的何種困境，且於下文析論。

（二）張綖對元代杜詩學在接受與突破

元代杜詩學著作雖然不多，但對後世影響深遠，張綖即受元人觀念與方法之濡溉。元人對其影響主要表現釋評對象之選擇及編年體例、釋評方法與內容等諸多方面。不過張綖雖受元代杜詩學影響，但他也有改造與創新，以下分述之。

²⁶ [清]紀昀等編，《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卷174，頁3520。

²⁷ 周采泉著，《杜集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303。

²⁸ 周采泉著，《杜集書錄》，頁304。

1. 評選對象和繫年方法

《杜律本義》和《杜詩通》在評選對象的選擇上延續元代杜詩學觀點相當明顯，前述《杜詩通》乃參照范梈批點成書，但值得注意的是，今見《范批》中：〈憶昔〉（其二）、〈遣興〉、〈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橋陵詩三十韻〉、〈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遊修閣（覺）寺〉、〈客居〉、〈短歌行贈王郎司直〉等九首詩，並未收錄於《杜詩通》中；而《杜詩通》則增列了：〈臘日〉、〈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崔氏山東草堂〉、〈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九日〉（去年登高）等九首《范批》未收之作；此外〈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杜詩通》全部收錄，《范批》只錄五首。

《杜詩通》想要符合《范批》所樹立的「葩經之數」，然其所刪除者沒有七律，新增列的則悉為七律，他重視杜甫七律之態度於此可見。張綆遵奉杜甫七律，也是受到元代的影響，《杜律本義》雖名為「杜律」，實評杜甫七律 151 首，而不及五律。

專以杜甫七律作為評說對象始於元人張性《杜律演義》，杜甫作為七律藝術風範的奠基者，他的七律本有不同於其他各體的創造意義，葉嘉瑩〈論杜甫七律之演進及其承先啟後之成就〉論之甚詳。²⁹ 杜甫七律備受後人推崇，宋人如釋惠洪（1071-1128）《天廚禁鱗》中以杜律為「錯綜句法」之例；³⁰ 葉夢得（1077-1148）以杜詩說明「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眾流句」³¹，宋末的方回（1227-1305）編《瀛奎律髓》，更是將杜甫七律推崇至無以復加的典範地位。元人

²⁹ 本文收錄於葉嘉瑩，《杜甫秋興八首集說》（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4年），頁1-72。

³⁰ 張伯偉編校，〈天廚禁鱗〉，《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28。

³¹ 〔清〕丁仲祐編，〈草堂詩話〉，《續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頁229。

則更進一步，有了專門分析杜七律的《杜陵詩律五十一格》、《詩解》等專門著作；至於元末張性編《杜律演義》，則是第一本以單一詩人單一體裁成書的詩學著作，此書後以《杜律虞註》之名大行於明代，張縉受此書啟發而作《杜律本義》，其兄弟張繪後序曰：

元進士金溪張伯成嘗著《杜律演義》，今訛傳《虞註》者是也。永嘉羅峰張閣老又為《釋義》，二書優劣，不待論而可知。其間俱不免有失杜之本旨者，愚兄南湖先生，因又為之註，以繼二宗之後，而以「本義」名，良有謂也。³²

是知張縉專以杜甫七律為說評對象，實乃繼張性之後，欲修正其說而著。

張縉選評杜詩幾乎不脫范梈批選、張性演義的範圍，不過張性所著，以「分類」為體例；《范批》之編，以「分體」為體例，但張縉皆則不取成法，全部改以「編年」為說，但其編年之法，亦有因創。

《杜詩通》和《杜律本義》皆為編年本。自宋代以來杜詩編年一直存在著一些爭議，但范梈開始採取一種改良式的編年法，他以詩體分卷，每卷之中再分為：「開元間留東都」、「天寶以來在東都」、「至德二載歸至鳳翔」、「至德二載丁酉在賊中」、「至德二載夏自賊中達行在」、「收京後作」、「乾元元年夏六月初為華州司功」、「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自秦州如同谷」……等。范梈以杜甫的大略生涯階段為編詩斷限，不強求每一首詩繫於何年何月。

張縉或許從《范批》中體會到這個作法的好處，也就是杜詩逐首

³²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720。張閣老（1475-1539），本名張璉，字秉用，號羅峰，後因犯御諱，更名張孚敬。歷來所載，張孚敬有：《杜律訓解》、《杜律釋義》、《杜律釋》等作品，張忠綱《杜集敘錄》考據應為《杜律訓解》為正，內容乃以張性《杜律演義》為底本的杜甫七言律注本，詳見張忠綱、趙睿才、綦維、孫微編，《杜集敘錄》（濟南：齊魯書社，2008年），頁152-153。

編次有實際上的困難，如果用一個「區段」的概念來編詩，可以避免對很多不確定年代之作的穿鑿附會。他在《杜詩通》卷一「開元天寶年間所作」下說：

觀杜詩固必先考編年，據事求情，而後其意可見。然編年非公自訂，不過後人因詩意附之耳，夫史傳編年，已有失其真而不可盡信者，又況數百年之後，徒因詩意以求合史傳之年耶？若〈北征〉、〈發秦州〉、〈同谷〉等篇，及公自註年月卓有明據，固無可疑，其餘諸篇，時之或先或後，亦未必盡實，觀者要當以詩意為主，不可泥於編年，反牽合詩意也。……今惟大約標三宗年號於卷首，其逐詩編年頗為考訂，分註題下，使覽者更詳焉。³³

只是張綆不以杜甫生涯為分卷指標，而以玄、肅、代三宗年號為分卷，有些詩再於詩題下說明月份季節，有些則無。張綆對詩歌的繫年，大致依照《范批》為參考，如〈晦日尋崔戢李封〉，張曰：「諸本編作乾元元年，是年春公方在諫省，詩詞皆非居官語意，鯨吞九州、地軸為翻，正極亂時也，范公定為陷賊時作，良是。」³⁴ 但也有一些例外，如〈前出塞〉，張綆曰：

單譜定在開元二十八年，黃氏以為乾元時思天寶間事而作，范編在〈九日寄岑參後〉，則以為天寶年間作矣。今詳其詞，黃

³³ 〔明〕張綆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19-20。

³⁴ 〔明〕張綆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114。此詩有三說：乾元元年、至德二載、天寶十五年。《范批》泥於詩中「長鯨吞九州」、「地軸為之翻」等語，目為安史之亂，然觀全詩詩意，前半「春氣漸和柔」、「每過得酒傾」等語，似非亂時所有，仇兆鰲引盧世樞語定為「天寶十五載，與〈蘇端薛復筵〉為一時作。」似較為可信。見〔清〕仇兆鰲，《杜詩詳注》，頁296。

氏以為追作者良是，但其事在天寶，仍依范編。³⁵

此篇張綆認同黃鶴（?-?）「追憶而作」的看法，卻仍依《范批》之編年，「其事在天寶」之說頗感牽強。不過如〈醉歌行〉，張綆則據杜甫自注「從姪勤落第歸作此以別之」曰：「此詩范定在至德二載，是時公方陷賊中朝，勤安得有落第之事？」³⁶ 可見張綆雖依《范批》，但偶有自己的判斷與更正。

2. 釋評方法與內容

《范批》類似劉辰翁之批點，以圈畫符號標示杜詩精神緊要處，文字意見本來不多，張綆雖稱「由清江之意而逆杜子之志」，³⁷ 但實際上，張綆的徵引不多，《范批》對杜甫長篇往往分結論述，張綆對此多有採納，如〈送高三十五書記〉，張綆曰：「范公分作四節，首節欲適告翰務農息兵……第二節言適意氣倜儻……第三節又致戒勉之詞……四節則言長恨不得與適權合。」³⁸ 除了這種分節說詩學步范梈，張綆對杜詩的解讀也偶用范梈之見。較有代表者如〈前出塞〉，張綆抄錄：「范註：前後出塞皆傑作也，有樂府之聲而理勝。」³⁹ 又如〈新婚別〉，《范批》於「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下注曰：「顛沛流離之際，猶有是婦人者，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何心哉？」

³⁵ [明]張綆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47。

³⁶ [明]張綆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83。

³⁷ [明]張綆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17。

³⁸ [明]張綆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77。

³⁹ [明]張綆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47。

⁴⁰《杜詩通》全引此語。又如〈杜鵑詩〉，首四句宋人已有爭議（偽）王洙注：「識者謂此詩上四句非詩，乃題下甫自注爾，後人誤寫。」偽蘇注同樣也引用了這個看法，⁴¹後辯證此說者眾，《范批》句下夾注：「此詩起句爾，古詩似此重言疊韻更無倫者何限，何必以為序？」⁴²張縉不採他說，僅引范說；同詩「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下，《范批》：「亂臣賊子聞是詩者，亦可警矣。可以人而不如鳥乎？」⁴³張縉也抄錄了這個說法，可見張縉除了在選評對象及編年上依循范梈，《范批》中較為詳盡的論詩文字也為張縉所採納。不過張縉也不盡然完全同意《范批》，如〈新安吏〉，《范批》曰：「天地無情，而僕射為父兄，當時之人心可知，朝廷之大體可悲矣。」⁴⁴張縉雖然也抄錄了這段文字，但他並不同意此說：「如范註，則子美直指君上無情，豈其意哉？」⁴⁵顯然張縉將范梈「天地中無情」釋義為君王朝廷對人民缺乏憐憫之情的解釋並不苟同，由此可見張縉論詩，其政治立場較為保守，將杜甫想像為一明代皇權下的忠臣，而非唐代以儒家精神為本，具政治理想主義色彩的唐代士人。⁴⁶

真正對張縉論詩形式與觀念產生影響的是張性的《杜律演義》。

《杜律演義》突破傳統杜詩學箋注、評點等論詩形式，「移講經之法以言詩」，在析論杜詩內容時辯證訛謬、闡發己意，剖析隱藏在文字脈絡底下的幽深旨趣，為初學者或非專業讀者提供讀詩線索，享

⁴⁰〔元〕范梈批點，鄭鼎編，《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52。

⁴¹〔宋〕徐居仁編，黃鶴補注，《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臺北：大通書局，1974年），頁1069。

⁴²〔元〕范梈批點，鄭鼎編，《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73。

⁴³〔元〕范梈批點，鄭鼎編，《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73。

⁴⁴〔元〕范梈批點，鄭鼎編，《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52。

⁴⁵〔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211。

⁴⁶有關杜甫儒家思想及政治理想可參陳弱水，〈思想史中的杜甫〉，《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頁183-234。

受讀詩樂趣。以宋人為代表的傳統注疏派認為疏通典故名物，輔以繫年時事即能明白詩意；後評點詩法派認為標出詩中關鍵字句，濟以章法分析即可名作者用心。但這些對於許多讀杜者並不管用，因此張性以長篇文字說解詩歌，明確清晰，極受讀者歡迎。

《杜律演義》在詩前標出格法、年月，詩中加以圈點，詩後附以注釋，然後「演義敷陳」詩中主旨大義，《杜詩通》和《杜律本義》基本上承襲了這個格式，如〈閣夜〉一篇，《杜律演義》題下標明「在夔州作」、詩尾注以「對起格」，詩中圈點領聯，注釋中注「夷歌」及「孔明廟」，「演義」的部分則包括了「夜宿閣中，高寒不寐，將曉而作」之背景說明、「（領聯）此二句雄渾瀏亮，冠絕古今」之讚譽；「感忠逆賢否之同歸于盡，人生亦徒然耳」之詩意，最後以「人事多違，音書久絕，如此之寂寥者，乃適然也，豈固為我之困者哉？」詮釋杜甫面對苦境之超越與開脫。⁴⁷

《杜律本義》則於題下注「是年（永泰大歷年間）冬作」，詩中圈點領聯及尾聯；詩末亦附註釋，駁斥舊說以「三峽星河影動搖」為「民勞之應」，並注「夷歌為蠻腔」、「臥龍謂為孔明」、「躍馬謂公孫述」等；「本義」的闡釋則說明此詩前景後情，並用杜〈寫懷〉詩句「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闡述「野哭」、「夷歌」之哀樂對照，並歸於「忠逆不同，亦同歸於盡，然則人是音書漫從寂寥也，我何憂傷耶？」之詩旨，末引韓愈（768-824）詩：「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點出「憂思之甚，聊以自解」之本義。⁴⁸

兩書除了內容略有出入，批評形式、論述方向與討論重點，幾乎是完全相同的，篇幅也差不多，可見張繪所言「《杜律演義》……不免有失杜之本旨者，愚兄南湖先生，因又為之註，以繼二宗之後」所

⁴⁷ [元]張性撰，《杜律演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100。

⁴⁸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671-672。

言不虛。⁴⁹ 所以《本義》、《演義》間的差別，只在對詩旨的看法有所不同，以文字說明自己的體會並自由詮釋詩意，提供讀者閱讀參考而助於理解，都是承襲《杜律演義》而來，《杜詩通》中也使用了相同的辦法，可見敷陳大義式說詩方法，已漸取代了純粹的評點或注釋之法，事為杜詩學上的一大轉變。

綜上所述，張縉的杜詩學承衍元代而來，在批評對象的選擇上，在批評方法、形式與要點上，都和范梈、張性等人的著作有極深的關係，雖然張縉亦有其突破，但這種說詩之法，往往存在著某些困境，以下略言之。

三、張縉杜詩說解的用心與困境

張縉既因前人論詩「不免有失杜之本旨者」而作《杜詩本義》、《杜詩通》，其專力於將詩說得明白通透且合於杜甫本義為著書目標，其讀者在序跋中也稱：「……敬受而讀之，則凡平日有疑於杜者，皆渙然冰釋，且知作詩法度，如此其嚴也。」⁵⁰ 「凡作者忠憤之所寓、音律之所原、才情之所蘊，逆而指明之。……使誦其詩於千載之下者，不復畧有疑義。」⁵¹ 是知張縉詮解杜詩，應有其個人會心之處；而他的說解，亦不免存在一些侷限與疑問，以下即就此兩端分述之。

⁴⁹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720。

⁵⁰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720，張繪語。此段文字，亦出現於張守中〈杜詩通序〉，殊為可怪。

⁵¹ 張鳴鸞（?-?），〈杜工部詩通跋〉，收入[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495-496。

(一)《杜詩通》、《杜律本義》之內容與特色

張縉對不少作品的討論頗能盡杜詩之微曲，如楊倫《杜詩鏡銓》論〈後出塞〉五首採納張縉的說法：「《左傳》：『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前四章著明皇黷武不戢，過寵邊將，啟其驕恣輕上之心，末則直著祿山之叛，以見明皇自焚之禍也。」⁵² 此說藉《左傳》論唐事，評論中暗寓杜甫的詩史批判精神，見解十分精到。又如〈祠南夕望〉末二：「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既言「清絕」，又言「長嗟」，其意究竟如何？《杜詩詳注》引張注：「如此清絕之地，徒為遷客羈人之所歷，此萬古所以同嗟也。結語極有含蓄。」⁵³ 可見張縉之說詩，往往能見杜詩所未言出之深意，助讀者理解杜甫之用心。又如杜甫名作〈秋興〉八首，仇兆鰲《杜詩詳注》全引張縉評論：

〈秋興〉八首皆雄渾豐麗，沉着痛快，其有感於長安者，但極摹其盛，而所感自寓於中。徐而味之，則凡懷鄉戀闕之情；慨往傷今之意，與夫外夷亂華、小人病國，風俗之非舊，盛衰之相尋，所謂不勝其悲者，固已不出乎意言之表矣，卓哉一家之言，竄然百世之上，此杜子所以為詩人之宗仰也。⁵⁴

此評從文字、風格、主題、詩史意識及自我感懷等方面立論，可謂面面俱到地表現了杜甫的成功與偉大。這類評述，皆可見張縉論杜有其不凡眼光。如果我們將張縉和前人相較，則更可見其論詩之進步。

影響張縉的張性，在《杜律演義》對杜詩之闡釋有時比較簡略粗糙，錯誤也不少，但仍受到廣大讀者喜愛，原因就在於他的說解能夠輔助文化素養不高的讀者進入經典，這也說明了「讀詩」並非簡單之

⁵² [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天工書局，1988年），頁105。

⁵³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頁1956。

⁵⁴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頁1498-1499。

事，讀杜詩尤其困難。相較於《杜律演義》，張綆的《杜律本義》和《杜詩通》在詮說上，更具專業讀者的指導功能，例如杜甫〈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
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
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疏。
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茆無徑欲教鋤。⁵⁵

張性《杜律演義》釋曰：

此詩公自述其野亭之居，以答嚴公也。言向者拜拾遺之時，亦會奏書以論時政，然本性但喜幽居也，故又言彼時乘官馬以充供奉，實為冒濫；今日幽棲此地，釣錦江之魚，乃其真情也。第三聯以謝安比嚴公，以阮籍自比，言嚴公喜出登臨，則公所逢迎之禮，豈謂其踈略哉？若果然枉駕出城而來，則我當除道以相待矣。⁵⁶

此說雖也不差，但「答嚴公」原由及詩意相關部分皆無交待，張綆《杜律本義》則論之較詳：

此公酬答嚴武寄題野亭之作，武原倡云：「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駿驕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須馳駿馬，終須直到使君灘。」（〈寄題杜拾遺錦江野亭〉）公詩前四句言：「我雖嘗為諫官，而性本在隱逸，昔時濫職侍從，今乃真得遂其性矣。」此答武首二句也。五六言嚴公為總制，不倦登臨，本有瀟灑忘勢

⁵⁵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頁886-887。

⁵⁶ [元]張性，《杜律演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167。

之意，故我得親近，而亦焉知禮法之疎，蓋恃其能知己耳。此答武中二聯也。末言聞嚴公枉駕以顧，將除道候之，則答其尾二句也。緹案：武詩中二聯，欲公謙晦自處，少貶剛傲以徇時，且欲其溫故攝疾以善保焉，其意厚矣！好事者乃因「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謬為武有殺公之說，《新唐書》遂據以為信，不有君子辯之，豈不誤哉？⁵⁷

張緹引出嚴武原詩，並解析杜甫的針對性，尤其「恃其能知己耳」之說，張性不能體會，因此也就不能明白杜甫和嚴武的交情，以及此詩為何要這樣寫。張緹最後一段案語，在於辯證嚴武對杜甫的溫厚友誼，但此句從宋代開始即遭誤解，張戒（?-?）：「嚴云：『莫倚善題鸚鵡賦』，杜云：『阮籍焉知禮法疎』，二人贈答，不可謂無意也」；⁵⁸ 劉克莊《後村詩話·後集》：「世傳嚴武欲害子美，杜集載武贈杜七言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則武果有無狀之意矣。不但以襴衡待杜，亦以黃祖自處，粗暴如此，其母氏所以有官婢之憂也。」⁵⁹ 可見張緹說詩，不僅能從文本的對應關係來闡釋其脈絡，同時也能不拘於字面，並顧及詩中情感細膩微妙的轉折，揭發更為完整明確的杜甫詩意，較張性之說，尤見進步。

除了對杜詩體會確切、說明深入等優越之處外，張緹杜詩學還有三個值得重視的特色，說明如下：

⁵⁷ [明]張緹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578-579。

⁵⁸ [清]丁仲祜編，〈歲寒堂詩話〉，《續歷代詩話》（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頁570。

⁵⁹ 嚴武（726-765）欲殺杜之議題可參陳文華，〈與李白嚴武交情考辨〉，《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121-174。《新唐書》之說非本此詩而來，而是從《國史補》、《雲溪友議》等筆記而來。

1. 在評詩中帶出詩學主張

張縉不僅就單一詩作進行剖析，同時能以更為全面的眼光提出對杜詩的看法，如張縉論〈登高〉，末案語曰：

少陵詩有二派，一派立論宏闊，如此篇「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及「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等作，其流為宋詩，本朝莊定山諸公祖之。一派造語富麗，如「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等作，其流為元詩，本朝楊孟載諸公祖之。⁶⁰

張縉分析杜甫七律風格有二，頗具慧眼，錢鍾書（1910-1998）《談藝錄·七律杜樣》亦指出「杜樣」分為二端，「雄闊高渾，實大聲弘」者也舉「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為例，⁶¹然張縉此說卻早了錢氏三百年。張縉又能以此風格分派宋詩、元詩之祖述，彰顯杜甫對後人創作風格的啟迪，表現了他對詩學更為宏觀的體認。

又如〈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詩中「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⁶²張縉藉此發揮：

大槩詩才有二，有才華、有才力，詞情藻麗之謂華，氣量深宏之謂力。華配則翡翠蘭苕也；力配則鯨魚碧海也。華凡纖巧者皆能為之，若才力則非大手筆不能也。何、劉數子之作，不過詞華已耳，是以其力未工，雖兼鮑照，猶愁絕倒。彘彘之士，其得不見笑於大方家也。韓退之謂：「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正以其才力勝耳。然才力非可強為，必作者度越一世，然

⁶⁰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696-697。

⁶¹ 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社，1988年），頁172-175。

⁶²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111。

後風格高邁，自成一家。又公以薛華李白並稱，華竟不聞於後世，則不朽者，詞章果足恃乎？立言君子，其必有說矣。⁶³

此篇論及創作的根本及審美上的差異，其解「愁絕倒」之謂可能有誤，但才華、才力之分，實際上是對杜甫成就的肯定與推崇，同時「才力」之誕生並非全為天授，而來自於「度越一世」，也就是終其一生的追求與不斷自我超越，但張縉又感慨「詞章果足恃乎」，其中轉折令人深思。張縉在當時已能體會藝術創造之艱辛與無憑，從杜詩延伸到了對創作生命的反省，這種超越單一作品詮釋的讀詩眼光，可說是張縉論詩的特色所在，其論杜雖稱「本義」，但實則寓託了個人的詩學思想與人生感懷在其中。

2. 回歸儒家傳統思想之詩論

杜甫和其他詩人相較，本自表現出更積極的倫常意義，⁶⁴ 論詩者也不無著眼此端，「一飯未嘗忘君」、「人憐其忠」等舊說皆連屬儒家倫理思維。張縉論詩，則就單一詩篇發揮其儒家倫理觀點，如評〈無家別〉，便闡發「慎德」思想：

孟子論老老幼幼，天下可運於掌，推自刑於寡妻始焉。玄宗早平內難，資非不哲；夙愛同氣，性非不仁。其至老幼之民治此極者，徒以一妃子之故，唐人：「一曲霓裳四海兵」，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書云：「明王慎德，肆夷咸賓。」然則閭門之地，

⁶³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113-114。

⁶⁴ 此議題論者頗富，可參如趙海菱，《杜甫與儒家文化傳統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劉寧，〈杜甫忠君體驗與詩教：對楚騷傳統的變化〉，《唐宋詩學與詩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頁20-40等。

其慎德之原乎？⁶⁵

此說將安史之亂全歸咎於「一妃子」固然荒謬，但其評述君王宜由宮闈為修德之原，可見其道德意識所在，文中引《孟子》及《書經》論詩，亦可見其思想淵源。張縉不僅在政治上強調統治者修德的重要，對士人亦強調君子之德的培養，如〈遣意〉二首，張縉評曰：

世有大可憂者，眾人不知所憂，惟君子獨憂之；然世有可適意者，眾人不知所適，惟君子獨取之以自適。如「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此景此趣，誰不見之，而取之以適者，君子也。此其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而非夫人之所能與歟！⁶⁶

張縉從杜甫詩句中體察君子之德性，也就是獨憂世患且通達於物理，這反映的是君子的「志」與「誠」，張縉藉由闡述杜詩在道德性上的優越，論證其藝術精神的偉大。

張縉論詩回歸傳統詩教，他說：

夫詩之道，與文異趣。文主正言，詩貴旁諭，抑揚詠嘆之餘，使人恍然而悞，悠然而得，其極也，有不知其手舞而足蹈者，此詩之體也。是故謂之溫柔敦厚之教，釋者必通此義夫，然後不謬於大指也。⁶⁷

此段簡要的文字正說明了張縉對詩的認識，其一，感興託寓的創作

⁶⁵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218。

⁶⁶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274。

⁶⁷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律本義引〉，《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499。

論；其二，諷詠忘我的閱讀論；其三，溫柔敦厚的詩教論。此三者又合而為一，詩人感物而動，咨嗟詠歎，用旁論以表意，類同〈詩序〉之「主文而譎諫」；⁶⁸ 詩發而為聲，動搖人心，讀者進入詩人所鋪設的象喻中，在感知欲露不露、反覆纏綿的文字意象底下悟而忘我，「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⁶⁹ 本〈詩序〉形容創作之過程，張綆移此作為閱讀的終極表現，這種忘我之情，近乎《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感動經驗，⁷⁰ 也就是作者透過文字，能引領讀者進入他曾流連的神思狀態；至於「溫柔敦厚之教」，則是傳統儒家之詩歌功能論，一本於「主文而譎諫」、「反覆纏綿」這種詩歌本位美學，作者以其修養覺察世界、進而表現感悟，讀者也能從比興含蓄的作品中反身涵養自我，陶化境界，而後完成溫柔敦厚之自我修養。是知張綆對詩歌之創作、欣賞，都是近於傳統儒家詩學觀。

反映在實際批評中，張綆發揚杜詩中的美刺精神，如評〈新安吏〉曰：「若〈新安吏〉之類則慰也；〈石壕吏〉之類則哀也，不得已而用（兵）者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則所以慰哀之者，亦刺也。」⁷¹ 然對朝廷君王之「刺」，張綆認為杜甫包蘊溫柔敦厚之思，如論〈中夜〉曰：「玄宗當承平之世，不能謹苞桑之戒，以致祿山之變……今公乃云：『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此得溫厚之體。」⁷² 也就是杜甫以人臣之立場，對於國君之失，並不直陳其失。

不過張綆對「溫柔敦厚」的理解，有時卻產生了一種時代上的偏

⁶⁸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頁16。

⁶⁹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頁13。

⁷⁰ 楊伯峻編著，《論語譯注》（臺北：源流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頁75。

⁷¹ 〔明〕張綆著，〔明〕張守中編，〈杜律本義引〉，《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211。

⁷² 〔明〕張綆著，〔明〕張守中編，〈杜律本義引〉，《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413。

誤，他所謂「溫柔敦厚」並非來自天性與修養之自然流露，而是後天懼禍的逃避心理，如〈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有「將詩不必萬人傳」之句，⁷³ 張縉釋曰：

蓋詩之道有美刺焉，而必及時事，如不得乎溫柔敦厚之教，殆將有種豆種桃之禍，即不然，亦取時忌。蘇子瞻好以詩刺，愛之者曰：「西湖雖好莫吟詩」；柳子厚送劉禹錫云：「直以慵疎遭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公慮韋之疎也，故為此語以戒，其愛之也至矣。⁷⁴

此說以楊惲〈報孫會宗書〉及劉禹錫（772-842）〈戲贈看花諸君子〉得禍喻諷刺當道之危險，就杜詩而言不免詮釋過度，但可見「溫柔敦厚」在張縉心中，不僅是一種詩歌對人格之涵養，同時也是創作者避害的一種手段，這種對創作理想之誤解與扭曲，實是張縉論詩中最为迂腐之處。⁷⁵

3. 多引他人詩作以為參照

張縉論杜另一特色是常舉他人作品作為參照，如〈兵車行〉張引梅聖俞（1002-1060）〈田家語〉詩：「老吏執鞭朴，搜索稚與艾」等句，言「民兵可哀」。⁷⁶ 張縉運用他人詩作，一方面是用來強化自己

⁷³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律本義引〉，《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451。

⁷⁴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452。

⁷⁵ 不過此類對詩歌創作的潛規範在明清評論中時時可見，當為文另述，此舉一例，浦起龍論〈杜鵑行〉：「曰『羞帶羽翻』明為鳥言，非他有所為也。直至『萬事反覆』亦復含而不露，文人曉此，可以免於詩禍矣。」見〔清〕浦起龍，《讀杜心解》（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9年），頁205。

⁷⁶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46。

的觀點，如杜甫〈詠懷古蹟〉（「群山萬壑赴荆門」），張綆認為：「時肅宗以少女寧國公主下嫁回紇，公主臨別之語，聞者酸心，公故借明妃之事以哀之。」後評又引歐陽修（1007-1072）〈唐崇徽公主手痕〉，指出其中「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一聯，表現出「中國失其體」、「堂堂帝王之尊。乃捐所愛為腥羶犬羊之配，謀之不臧，一至於此，獨謂國有人乎？」⁷⁷ 的悲遣之意。張綆以為明妃（?-?）之去國、寧國公主（?-791）、崇徽公主（?-?）之出嫁，皆指向「國家無人」、「中國失其體」之政治上的失敗，因此歐陽修的詩，與朱熹（1130-1200）「玉顏肉食一聯，以詩言之，第一等詩；以議論言之，第一等議論」之評，⁷⁸ 皆可做為他將杜詩引伸為時事批判的參照，雖然杜甫此詩是否因寧國公主事而作本身相當可疑。

另一方面，張綆以其他詩作對照於杜詩，往往是要彰顯杜甫的偉大與影響。例如評〈月夜〉而曰：「韋應物〈悼亡詩〉云：『幼女復何如，時來亭下戲』，語意極悲，蓋本乎此。」⁷⁹ 論〈羌村〉：「陳後山：『了之不是夢，忽忽心未穩』，翻意亦妙，不如杜語自然。」⁸⁰ 論〈除草〉：「末句（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讐）用左傳語結之，方露本意。柳子厚〈捕蛇者說〉至篇終方說出孔子『苛政猛於虎』一句，襲此格也。」⁸¹ 論〈野人送櫻桃〉，末引韓愈、韓偓詩而曰：「觀二韓之作，

⁷⁷ [明]張綆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419。

⁷⁸ [明]張綆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419。

⁷⁹ [明]張綆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118。

⁸⁰ [明]張綆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144。

⁸¹ [明]張綆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387。

則少陵為不可及」。⁸²

這些詩例彰顯了張縉不僅讀法細密，聯想也相當豐富，他在評述中說明杜甫對後世詩文的啟發霑溉，也表明他人不及杜甫的評價，正如他在〈水閣朝霽奉簡嚴雲安嚴明府〉一詩評中謂：「杜公詩無所不具，後人各因其資之所近而祖之，皆足以名家」，⁸³ 這類比較式的評註，也可說是張縉論詩的一大特色。

綜上所論，可見張縉杜詩學之特色所在，然每個時代與論者，皆有其不能自覺、無可避免之弊病，張縉之杜詩學亦然，以下略言其不足之處。

（二）張縉杜詩學之不足

在學術史上，同樣有「本義」及「演義」的詩學著作是《詩經》。宋代歐陽修作《毛詩本義》，後人評為：「修作是書，本出於和氣平心，以意逆志，……其所訓釋，往往得詩人之本志。」⁸⁴ 又有元代梁寅（1303-1389），依朱熹所著而推演其義，完成了《詩演義》，被後世評為：「淺顯易見，切近不支」。⁸⁵ 此二書皆以注釋、闡述詩旨為主，不守毛、鄭舊法，發揮個人新意較多。也就是說，解讀詩作，一方面要能對詩人所寫出的部分加以梳理、解釋；另一方面要能對詩人未寫出的部分加以推測、衍伸。前者問題不大，後者的爭論卻多。歐陽修將《詩經》文學化，⁸⁶ 張性、張縉這兩位儒生為杜律作「演義」、「本

⁸²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577-578。

⁸³ 《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本頁原稿闕，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冊4，頁432，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補。

⁸⁴ 〔清〕紀昀等編，《四庫全書總目》，卷15，頁235。

⁸⁵ 〔清〕紀昀等編，《四庫全書總目》，卷16，頁350。

⁸⁶ 此說學界亦有不同意見，詳可參郭全芝，〈歐陽修《詩本義》的經學性質〉，《經學研究集刊》

義」，則是試圖將杜甫七律經典化，透過嶄新的評論形式來對杜甫七律推崇與致敬。他們雖然也都有不少創見，但不可否認，一如每一代的杜詩學，也都存在一些不足和爭議。

張縉論詩有時拘於時代文化而有偏見，有時則不免陷於主觀，在解釋上頗有偏差，如論〈玉臺觀〉：

……是詩刺其淫穢耳。言高山之觀奉尊神以惑世，遂有借黃道流者入通觀姑，而觀姑誘致外人，始知秦女真善吹簫，能引鳳至矣。……大抵觀庵姑尼鮮有不私通者，顧為政者當嚴禁絕之道耳。按是詩之刺如此，註者皆以為美觀之為仙境，可謂誤矣。正如韓退之華山女詩人，皆不覺其為刺，此又見二公善詠時事，隱而不露，然亦未嘗不微而顯也。⁸⁷

此詩歷來無此說法，張縉獨排眾議，以杜詩意在「刺其淫穢」、引申為「當嚴禁絕之道」。此論背離杜意甚遠，不免驚世駭俗。但考量明代社會風氣驕奢，宗教管理鬆弛，不少世情小說中，也都對惡俗僧尼之貪婪與淫穢頗有描寫，⁸⁸ 張縉可能是基於對當代社會之觀察與不滿，藉闡釋杜詩來提出批判。但就詩論詩，這類評述不免失之穿鑿與過度引申。

近世詮釋學（Hermeneutics）已體認到詮釋不僅在於說明（to explain）或翻譯（to translate）一個陌生或經典的文本，經常更是屬

第3期（2007年10月），頁211-222。

⁸⁷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594-595。

⁸⁸ 如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34回〈聞人生野戰翠浮庵，靜觀尼畫錦黃沙巷〉即有露骨描寫；這類研究成果豐富，詳可參田冬梅，《明代世情小說中的僧尼形象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郭輝，《明清小說中尼僧形象之文學與文化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劉翊群，《「三言二拍」佛道人物形象研究》（臺北：臺灣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等著。

於詮釋者的創造；其所涉及對作品意義的重返，有時反而是一種對作品原意的消解。⁸⁹ 也就是說，我們在當今已能接受透過詮釋作品來呈現自己的思想，一如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戀人絮語》之於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少年維特之煩惱》的互文關係。但回歸於十六世紀的中國明朝，這種理解當是無稽之談。因此我們回顧張縉的杜詩學，他以「本義」來命名自己的詮釋著作，即可體會他對「重返」文本原意的興趣和意志，以及他非常純潔的自信心。故他論詩先透過注釋理清詩中的字詞典故，再以近乎翻譯的方式來闡說杜詩的內容，這也意味著他認為杜甫詩對於某些讀者而言，是一個無法理解的語言組織體，而他的工作就是將這語言組織轉換成讀者能理解的語言。但這個過程中，其翻譯的優劣，並不取決於忠實度，反而取決於他個人讀詩時的延伸與想像。

然我們必須體會，不僅張縉如此，杜詩學之開展，自始目的即在於對杜詩作出正確的還原解讀，但如何能正確回歸作者的本意，本自是一件相當困難的學術工作。張縉對此亦有自覺：

杜少陵雖稱詩史，而沉鬱頓挫，感人於言意之表，是其自負。說者乃謂其句句字字咸有意藏焉，則牽合附會，而非其本意者多矣。夫釋詩之病，舛誤者其失易知，牽會者其失難辯，將使初學之士惑焉。……大抵理在人心，古今不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昔山谷黃太史觀杜詩，嘗欲於欣然會意處箋數語，復恐人求之於易，謂不若使學者思而自得之。大方之見如此，讀杜者要當知山谷此意可也。⁹⁰

⁸⁹ 詳參〔美〕理查德·E. 帕爾默（Richard E. Palmer）著，潘德榮譯，《詮釋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13-93。

⁹⁰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律本義引〉，《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499-500。

黃庭堅（1045-1105）在〈大雅堂記〉中稱宋代杜詩學：「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寄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⁹¹ 是知「商度隱語」式的詩歌解說在北宋已成風氣，而也有學者對這種過度詮釋而淪為穿鑿附會的臆說產生反省。張縵論〈杜鵑行〉：

此詩興也，非比也。蓋論人事之無常耳……舊注謂比明皇居西內，然「羞帶羽翮傷形愚」，豈所以論君上哉？說者但知杜子忠不忘君，遂篇篇附會其說，斯則謬矣。⁹²

此篇自黃鶴以：「上元元年七月，李輔國遷上皇，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上皇不憚，成疾」注本詩，⁹³ 後人編年、解釋此詩皆從黃鶴注，但張縵對前人說法不以為然，認為此詩並無諷諭時政，僅託「人事無常」之意。顯然張縵在說詩過程中，有心避免附會杜甫諷諭時事的解釋方法，但他在實際批評的過程，卻仍不免重蹈覆轍，如下幾例：

論〈九日寄岑參〉：

「吁嗟」至「川浸溜」言久雨害稼，託興以比小人蒙蔽其上，人莫誰何，主暗民窮，上下失所。⁹⁴

論〈哀江頭〉：

「輦前才人」四句，雖是鋪敘當時從行之人如此，其實託意言祿山之逆輩，前蒙親倖也。「帶弓箭」材武也；「白馬嚼金勒」

⁹¹ 〔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17，頁180。

⁹² 〔明〕張縵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273。

⁹³ 引自〔清〕楊倫，《杜詩鏡銓》，頁316。

⁹⁴ 〔明〕張縵著，〔明〕張守中編，〈杜律本義引〉，《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100。

恃寵驕也；「翻身仰射」反面肆逆也；「中雙飛翼」傷其同歡。⁹⁵

論〈月〉：「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

蟾兔以比近習小人，「入河不沒」不離君側也；「搗藥長生」竊國柄者不絕也。⁹⁶

論〈題鄭縣亭子〉：「巢邊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

「雀群欺燕」、「蜂遠趁人」因所見以比小人之黨，欺害君子如此。⁹⁷

論〈初月〉：

此詩主言肅宗無疑。即少陵無此意，而郢書燕說，不為無理。蓋新君及位，必有以新天下之耳目，一下天下之心志，「河漢不改色」，是猶夫舊也；「關山空自寒」，是失其望也。「露滿菊團」，陰邪勝而壓君子，則何以成正君之功哉？⁹⁸

上引詩例，如〈哀江頭〉、〈月〉等篇之解說，乃張縉創新的見解；〈題鄭縣亭子〉、〈初月〉等，則在張縉以前的舊注已有類似說法，宋代（偽）王洙注即云：「野雀欺燕、山蜂趁人皆感時而作，故未有幽獨傷神。」

⁹⁵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律本義引〉，《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120。

⁹⁶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152。

⁹⁷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196。

⁹⁸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201。

⁹⁹〈初月〉一詩在宋代即已有比附之論，魏泰（?-?）：「夏鄭公竦評老杜中秋月詩：『初生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為意在肅宗，鄭公善評詩也。」¹⁰⁰夏竦（985-1051）此評廣為宋代注家所重視，薛蒼舒（?-?）即引以言之，並被收錄於《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中，¹⁰¹不過此說曾遭劉辰翁質疑，但元朝的《杜律趙註》則依然採取舊說：

夏鄭公以此詩意主肅宗，注者曰：「三喻肅宗即位於靈武，四喻肅宗為張皇后、李輔國所蔽」。劉云：「句句欲比，卻如何虛此結句？」今按結句（「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喻己愛君憂國，不覺泣涕之沾襟也。未知須溪肯如此否？¹⁰²

張縉顯然明白這個爭議，他以「即少陵無此意，而郢書燕說，不為無理」作為詮釋之方法論，¹⁰³直接合理化了可能不是杜甫本意的詮解。是知張縉評詩，有其相當主觀的一面，這種主觀臆說一方面能創造前人所不及的深刻意見；但一方面則流於失其根據的杜撰。

最後，我們可思考一個問題：張縉既已感於前人說詩貽誤後人，為何自己說詩仍重蹈覆轍呢？

如果我們觀察張縉此類附會，全部指向政治性的暗喻，也就將杜詩視為一深度反應唐代政治的詩化文本，他對杜詩的詮釋，綜合前文以觀，《杜詩通》想要「合於毛詩之數」，論詩「亦若考亭之傳詩也」，

⁹⁹〔宋〕徐居仁編，黃鶴補注，《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 923。

¹⁰⁰〔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收入〔清〕何文煥，《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頁 192。

¹⁰¹〔宋〕徐居仁編，黃鶴補注，《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 779。

¹⁰²〔元〕趙汭，《杜律趙註》，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 165。

¹⁰³〔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 201。

¹⁰⁴ 在評論中則揭舉「慎德」、「詩教」等論詩主張，此類皆屬儒家政教思維下的評論。而這套論詩的觀念與方法，最主要來自於詩經學的長期累積。以影響最大的〈詩序〉而言，他們對詩歌抒情性的認識，乃建立在政治生活的想像之上，將「比興」還原於「寄託」，也就是詩中所寓，解詩者多半認定為屬於詩人的政治懷抱或政治遭遇。是知張縉求本意反失其真的論詩結果，並非缺乏警醒的自覺，而是受到詩序以降的讀詩傳統所影響。也就是在古典詩學文化的結構中，以「寄託」作為創作動機、以「比興」作為創作手法、以「甄隱」作為論詩目標，這樣的認識在傳統學者或詩人中根深柢固，因此在「甄隱」由「比興」所涵蓋的「寄託」時，便不免一再產生了解讀上的偏隅。也因此我們可以體會，中國古典詩在詮釋上，從早期就發展出一個特殊的現象，即詮釋者皆大膽宣稱「自我衍生之意」實乃「作者創作原本之意」，「演意」與「本意」涵為一體以應政教需求，也架構了古典詩詮釋的方法與態度。

另一方面，由於杜甫詩史意識濃厚，本身又表現出強烈的民族、國家意識，因此他的作品，更適合由〈詩序〉所開展出來的詩學文化，詩是小我在政教大環境下的流露與抒發，解詩者也要努力還原當初的情境才能示告其他讀者該詩的「本義」何在。因此，在〈詩序〉傳統和杜詩特質的交會下，杜詩的解釋史從宋代以來一直充斥這樣的風氣，期間如黃庭堅固有〈大雅堂記〉這樣的體會，然在錢謙益（1582-1664）眼中「儒服上冠……以譬君子；紈袴下服，……以譬小人。魯直之論，何以異於此乎？」¹⁰⁵ 可見錢謙益雖不滿「宋人解杜詩，一字一句，皆有比託」，¹⁰⁶ 而自詡「鑿開鴻濛，手洗日月」，¹⁰⁷

¹⁰⁴ 詹一元，〈杜工部詩通序〉，收入〔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5。

¹⁰⁵ 〔清〕錢謙益，〈注杜詩略例〉，《錢註杜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4。

¹⁰⁶ 〔清〕錢謙益，〈注杜詩略例〉，《錢註杜詩》，頁4。

但如論〈杜鵑行〉仍以「上皇遷居西內」一事為比附；他如「攝吾之心印杜之心」的浦二田，¹⁰⁸「庶幾得作者苦心於千百年」的仇兆鰲，¹⁰⁹「以求合作者之意，殆尚所云『鏡象未離銓』者」的楊倫，¹¹⁰其書中論杜，豈無穿鑿比附之說？

是知解釋杜詩而失於附會的問題，並非全來來自於解釋者本身的學養或才華，而是來自於古典詩學的文化結構，以及杜甫詩本身之特殊性。評者在無形中全盤接受了這套詩學文化，並從其中產生了認同的價值及信仰的原則、理想；這些窮一生精力於杜甫詩的評家，其妙論與謬論乃是一體兩面的存在，那些精闢的見解與危險的附會，往往只有一線之隔。張綆論詩不能超越這個文化對他的羈縻，其論杜詩的成就與弊病，也同時存在於他的體系中。

「少陵自有連城壁，怎奈微之事砥跌」，¹¹¹每一評家對杜甫的體會皆有洞見與不見，對張綆引述最多的仇兆鰲亦有反省：

凡登臨遊歷，酬知遺懷之作，有一念不繫屬朝廷，有一時不痼療斯世斯民者乎？讀其詩者，一一以此求之，則知悲歡愉戚，縱筆所至，無在非至情激發，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豈必輟轉附會，而後謂之每飯不忘君哉？¹¹²

這段文字指出了杜詩中的倫常特性，並非以呆板的附會才能體現，而是應存在於讀者意識中的思考方向，如此才能照見更宏大與淵博的杜甫精神。張綆說解杜詩固然細密完備，偶也見妙會於心的闡發，但他

¹⁰⁷ [清] 錢謙益，〈草堂詩箋元本序〉，《錢注杜詩》，頁 117。

¹⁰⁸ [清] 浦起龍，〈題詞〉，《讀杜心解》，頁 1。

¹⁰⁹ [清] 仇兆鰲，〈原敘〉，《杜詩詳注》，頁 2。

¹¹⁰ [清] 楊倫〈自序〉，《杜詩鏡銓》，頁 9。

¹¹¹ [金] 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之十。見狄寶心，《元好問詩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卷 1，頁 54。

¹¹² [清] 仇兆鰲，〈杜詩詳註·序〉，《杜詩詳注》，頁 1-2。

由政治立場比附杜詩深意，不僅無法克服他所要超越的傳統障礙，也顯示了他對杜甫真正的精神與藝術境界之體會，似乎尚有不足，前引《四庫總目》言張縉之杜詩學「失又在於淺近」、「均不能窺杜之藩籬」等評，可能皆是因為張縉力求說明詩旨，而忽略了詩歌藝術之本原及杜甫真正之追求，而這種現象，也是杜詩箋註、評點、詮說史上常見的困境。

四、結語

杜詩學史中的單一著作看似孤立，但彼此間往往有相當深密的互文聯繫，如宋代諸箋註本至於南宋由徐居仁（?-?）編、黃鶴補注而成《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此書又是元代張性《杜律演義》所參考並模範的底本；劉辰翁的批點，則為范梈所承，范梈「洗末宋之陋，而為皇元治世之音」¹¹³而有了《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這兩本元代的著作，又直接影響了明人張縉的《杜詩通》和《杜律本義》；張縉的評注，則又廣為清代注家所採錄，或也形成了影響後人讀詩產生心證的一種意見。這種互文性，或隱或顯，但絕不缺席。

本文主要討論張縉杜詩學之形成與得失，他在前人的基礎上對杜詩作出更為詳密貼切的體會與闡發，除了論述詩旨大意，也引帶出他的詩學觀點及偏向儒學傳統的文化心理，更能從其他作品的比較中展現杜甫的影響力及典範性，這些都是他的建樹。不過張縉也礙於時代與個人學養，對於詩歌的體會也存在著偏差之見和附會之辭。在相同的詩歌詮釋文化影響下，雖然他已自覺於前說過於穿鑿，有礙學者，必須加以修正，但自己亦無可避面地走向了相同的道路。

因此本文作為對張縉杜詩學的初步研究，一方面乃對張縉杜詩評

¹¹³ [元]范梈批點，鄭鼎編，《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頁210。

說之內容得失略言其大要，另一方面旨在透過張綆杜詩學來思考，古典詩學在對作品的詮釋上，為何長期陷於「甄隱寄託」之結構中；同時傳統評論中是否另有不由此徑為說的思考方法？張綆對其自我的杜詩詮釋謂「通」、謂「本義」，其說既作為杜詩學史上不可缺的一環，同時也使我們對探求「本義」與「會通」詩心之期許下所產生之評論結構，有了新的反省。

（責任校對：葉人豪）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
- 〔宋〕徐居仁編，黃鶴補注，《集千家分類杜工部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臺北：大通書局，1974年。
- 〔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
- 〔元〕范梈批點，鄭鼎編，《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臺北：大通書局，1974年。
- 〔元〕張性撰，《杜律演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臺北：大通書局，1974年。
- 〔元〕趙汭《杜律趙註》，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臺北：大通書局，1974年。
-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張南湖先生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冊68，卷附錄1。
- 〔明〕張縉著，〔明〕張守中編，《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收入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臺北：大通書局，1974年。
- 〔清〕丁仲祜編，《續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
-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
- 〔清〕何文煥，《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
- 〔清〕紀昀等編，《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9年。
- 〔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天工書局，1988年。
- 〔清〕錢謙益，《杜詩錢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二、近人論著

(一) 專著

- 狄寶心編注，《元好問詩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周采泉著，《杜集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張忠綱編著，《杜集敘錄》，濟南：齊魯書社，2008年。
- 陳文華，《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 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
- 趙海菱，《杜甫與儒家文化傳統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
- 劉寧，《唐宋詩學與詩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 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社，1988年。
- 〔美〕理查德·E. 帕爾默 (Richard E. Palmer) 著，潘德榮譯，《詮釋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二) 期刊論文

- 王燕飛，〈明代張縉的杜詩研究〉，《文藝評論》2013年第10期，頁42-46。
- 徐國能，〈元代詩法作品中的杜詩觀〉，《文與哲》第22期，2013年6月，頁305-353。
- _____，〈張性《杜律演義》研究〉，《東吳中文學報》第29期，2015年5月，頁61-95。
- 郭全芝，〈歐陽修《詩本義》的經學性質〉，《經學研究集刊》第3期，2007年10月。

(三) 學位論文

- 葉輝，《張縉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文學碩士論文，2000年。
- 劉姝潔，《張縉及其文學思想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

學碩士論文，2014年。

郭輝，《明清小說中尼僧形象之文學與文化研究》，天津：南開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10年。

劉翊群，《「三言二拍」佛道人物形象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論文，2004年。

Zhang Yan's Assessment of Du Fu's Poetry

Guo-Neng Xu*

Abstract

Historically, students of Du Fu's poetry have tended to treat each poem in isolation; however, as can be observed from critical studies of their ideas, method and form, Du Fu's poems are often closely related to one another.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Ming dynasty Confucian Zhang Yan's 張縉 studies of Du Fu's poetry in order to discern the relation between his three works on the subject as well as determine the influence of Yuan dynasty studies on his views.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Zhang Yan'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s found in Du Fu's poetry. It is argued here that while Zhang Yan succeeded in advancing the study of Du Fu's poems, he also proposed some preposterous and inadequate theories. On the basis of this observation, the article proceeds to consider the dilemmas encountered by Du Fu's critics through the ages, and the del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ch dilemmas and classical poetry.

Key words: Zhang Yan 張縉, Du Fu, criticism, versification, eight-line poem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